

# 对全球经济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张莱楠

## 世界经济走势趋向好转

世界经济经历过2008年次贷的洗礼,2010年以来的欧债冲击之后,终于露出复苏的曙光。2012年底以来,反映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些主要指标趋向好转,总体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

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相对优势明显。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改善,房地产市场复苏力度有所加大,制造业投资带动美国经济缓慢扩张。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稍有缓和。重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主权违约风险大幅下降,一些先行指标透露积极迹象,显示欧元区下滑态势或会稍有缓解。然而,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持续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远未摆脱衰退。三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返扩张区间。2013年2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0.8%,连续3个月运行在50%以上,但环比有所回落,意味着世界经济维持弱势复苏趋势。四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回到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产出缺口逐步收窄。

## 世界经济深层次矛盾未能根本解决

然而,就此判断全球危机已经过去

恐怕还为时尚早。世界经济既有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较大波动性,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复苏的力量还比较脆弱。发达经济体方面,尽管欧债危机相比前几年稍有缓解,欧洲央行也不断依靠扩张自身资产负债表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但并不能真正改变各国财政状况,各国偿付能力未有实质性改善。近期以来,塞浦路斯拉响债务警报、意大利大选僵局、西班牙债务前景继续恶化都意味着欧债危机远没有结束。

美国财政“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对增长形成拖累。美国经济未来的焦点在于债务率的削减。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为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政府减少开支即意味着经济总需求下降,与政府开支联系紧密的军工订单、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将受到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美国“全面自动减支计划”计划本财年850亿美元的开支削减将造成约7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拖累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新政”难以解决长期结构性顽疾。全球范围内日本政府是刺激经济最为激进的政策。安倍上台后主张财政宽松、“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走向大幅宽松的“三松政策”。然而,由于长期的需求缺口、人口老龄化以及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3年日本经济继续陷入停滞的可能性依然较大。而新兴经济体方面,尽管

比发达国家有增长优势,但伴随着自身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短板也日益凸显,内生增长较为乏力,结构转型将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 应做好中长期风险防控准备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持续,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们必须对危机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充分估计,做好中长期风险防控的机制和政策准备。

首先,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货币和贸易环境,中国需要系统应对,多管齐下:一是加快推动人民币成为弹性货币。人民币目前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人民币双向波动的特征已然出现。应参考短期均衡汇率和篮子汇率,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日交易幅度和明确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加权汇率波动上下限,真正使人民币变成弹性货币。二是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未来须加快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支付金额大幅增加,打通人民币资本国际国内循环。三是促进资源类企业“走出去”,在融资、经营和股权等多层次与境外上游资源类实业实现战略合作,控制关键资源,锁定市场风险,在矿业、农业等部门打破国际产业巨头垄断战略资源的局面,进而提高资本定价权。

其次,中国必须建立成本优势之外的新竞争优势,不断开拓高价值领域。按照世贸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仅比美国少156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稳出口”也是金融危机以来外贸政策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货币和汇率政策。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出口已经很难用价格竞争换取市场优势,因而货币贬值能够换取的贸易利益会有限,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需要使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大幅度提高对前瞻性、战略性、原创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投资,鼓励跨区域的合并重组,推动企业尽快实现结构升级,以便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

第三,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深度调整,中国亟待建立中长期风险防范机制。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全球长期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随着全球经济开始长期深度调整,政策因素将引导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向,并可能造成新的风险。当前,美联储正在临近货币政策转向的拐点,一旦美国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势必推动美元中长期走强,将对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向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本币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系统性风险,决策当局亟待加强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研究,并在重点领域做好把控。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 美欧建设自贸区的“醉翁之意”

李春顶

美欧自贸区构想酝酿已久,但由于利益的差别与分歧,长期陷入搁置。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侵袭打破了运转已久的均衡,融化了美欧一体化的坚冰,终于在不久前促使这对深处寒冬中的发达经济体走到了一起。

## 重塑国际游戏规则才是本意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言权和话语权的增强,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获得更多贸易利益的企图成为泡影。而美欧发达国家又不情愿失去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来制定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高要求贸易规则,并推动其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标准。目前,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果能够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联合欧盟,则发达国家重塑国际贸易新标准和新规则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

## 抱团过冬是导火索与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让美国和欧盟经济走入低迷,在轮番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后,国内政策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贸易别无选择地成为了美欧进一步提振经济的“救命稻草”。美欧经济产出约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双边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在欧盟的投资是在亚洲投资的3倍,欧盟对美国投资是其对中国和印度投资总额的8倍。这样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相互的区域一体化,对于相互贸易、投资和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地存在正向推动和激励作用。

## 中国应该及早应对

正如美欧联合声明所言,一个高标准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将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将解决监管问题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通过谈判,美国与欧盟将不仅有机会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投资,也将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进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显而易见,美欧区域一体化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相互的贸易与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甚至影响或构建新的多边贸易体系。

面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美欧区域一体化会产生贸易替代和转移效应,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其次,一旦美欧形成并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贸易利益可能会被进一步削减与剥夺;最后,美欧的一体化也可能会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鉴于此,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可有的选择包括: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形成,促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融入这些区域一体化安排,成为参与者影响新规则的形成,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 楼市有风险,提前做准备

胡宇

日前见到一则有意思的新闻。上海闵行区民政局在婚姻登记中心门口特意设立“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大幅公告警示牌,提醒各对夫妻勿为规避政策而轻率选择假离婚。

过去5年中国房价的疯狂上涨给人制造了房子只涨不跌的假象,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及房市投机者参与其中,贪婪地期望房价永远上涨,妄图捞得更多的好处。除了极个别具有理性和良知的房地产企业家能够清醒地建议政府抑制泡沫以外,多数市场参与者早已忘记了2008年房价曾经暴跌的历史。因此,市场日日夜夜期待各地出台国五条细则,寄望于政策能够强有力入市干预房价上涨的现实,现在看来,也只有望眼欲穿了。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了解,当下热议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归因于房地产市值上涨的贡献。自1998年至2011年,中国累计销售72亿平方米商品房,价值28万亿,现在的公允价值至少是40万亿。如果剔除商品房价值上涨的贡献度,中国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仅为100%,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高。

# 警惕投资冲高带来的隐患

黄卫挺

今年体制惯性对经济运行的压力将远大于改革红利,换届后的政治锦标赛将再度冲高投资,使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踟躇不前。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部分重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来看,一些地方出现了大幅调高今年投资增速目标的情况,部分地区甚至提出了“投资增速达到100%”的目标,投资冲高似乎不可避免。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高投资是完成较高经济增长目标的最现实途径,但是对于全国的经济运行来说,高投资将极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并阻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显示,除了1997年,历次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前后两三年都出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虽然此次投资冲高并不会带来如此高速增长,但最终也很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对未来发展带来困难。

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难以短期消解的情况下,中央宏观调控决策部门除了要从投资方向上把好关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这种投资冲高带来的宏观影响进行研判。笔者认为,应该重点警惕这种投资冲动带来的产能过剩、价格上涨压力和金融风险,并及早做好买单的准备,进行政策储备。当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投资冲高也会加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产能过剩加剧是投资冲高带来的第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近年来,从传统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投资的地方集体冲动下,产能过剩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威胁经济稳定。由于地方政府能够决定或者引导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以及存在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支持的产业领域,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产能过剩更加需要警惕。沿海港口的大规模建设也应该和其他基础设施

## 天然气价格或将上涨



改革方案几推敲,天然气价将上调。产业转型攻关难,能源优化是法宝。市场自然会配置,政府应该少指导。气荒多发因垄断,公平竞争除病灶。

赵天奇/漫画  
孙勇/诗

建设一样得到统筹管理,尤其需要从全国层面进行协调布局,避免其“产能过剩”。

投资冲高还将给当前高位运行的价格水平带来新的上涨压力。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受经济刺激政策和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我国价格总水平始终在高位运行。今年我国采取了“稳货币”的调控策略,但投资过快增长形成的巨大需求最终仍然会反映到价格水平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调控政策,投资冲高再加上外部宽松的货币环境、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我国的价格水平将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

投资冲动下的“财政敢于负债”隐含巨大金融风险。很多地方政府都将今年的投资增长寄托在城镇化或“城市升级”上,并且提出要“敢于负债”,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融资机制来看,其中蕴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后重新加上并强调了“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笔者认为这除了基于债券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之外,也是考虑到今年政府性融资的需要。然而,在现有政府性债务水平和财政性收入有限增长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过直接融资手段还是间接融资手段为“经营城市”进行融资,都可能导致过度负债的情况出现,形成偿债风险。

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必须提前有所准备,但是对各级政府投资冲动的治理并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改变这种“因循困境”博弈。下一步要在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转变中央政府职能的同时,加快协同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只有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考评体系,才能在根源上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